

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

郑 路

内容提要:混合经济的背景下,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作为市场转型过程的外显表现,既是一种十分突出的结构性变迁,同时又反映了市场化进程中分层秩序的变化。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本文对一个全国性城市样本的工作经历数据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市场渗入过程中跨体制职业流动的研究揭示了:(1)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后果;(2)“单位制分割”的松动与延续;(3)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变革的阶段性。

自1978年开始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如果按照波兰尼(Polanyi)的理想型分类,将中国原有的体制看成是再分配经济的话,那么历史在这20年间则目睹了另一个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兴起。与苏联、东欧几国的激进改革形成对照,中国施行的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推进改革的渐进战略(吴敬琏,1993)。体制外改革安排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发展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城镇中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为15万(占城镇就业人口的1.6%),到1997年增加到了1919万(占95.0%);三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经济)从业人员,从1985年时的6万人(占0.5%)增加到1997年的581万人(占28.8%);私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从1990年时的57万人(占3.4%)发展到了1997年的750万人(37.1%);截至到1997年底,城镇中的私营企业达到59.6万个,个体经营户达到1023.8万家。^①

面对这些急速增长的数字,人们不禁会问:这20年来是哪些人在进入这些非国有部门?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有着怎样的特征?是哪些因素在推动着他们的这种选择?这种流动现象又向人们显示了怎样的一个变化中的分层系统?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意识到,非国有部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这些部门中的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原有体制中流出的。因此,我们把本次研究的对象限定为,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我们调查截至的1996年秋季,从国有部门流动到非国有部门的那部分社会群体。

一、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与社会结构变迁

从6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把对社会流动和不平等研究的注意力放在对职业流动的测量上,虽然这种做法受到了来自阶级分析范式的挑战,但是已很少有社会学家否认职业角色

^{*} 首先感谢导师李强教授将我引入了社会学研究的殿堂,在学术上对我进行的精心指导。成文过程中还得到了郭志刚教授、宋时歌博士候选人的关心和帮助,并得益于与刘精明、洪大用、郝大海、邓建伟、吕新萍等老师和学长的讨论,在此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文章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作者本人承担。

^① 数字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130—131页,152—153页。“统计年鉴”中关于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从业人数的纪录是分别从1985年和1990年才开始有的。

在工业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职业作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纽带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职业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共同性还为职业流动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和经验的基础(Featherman等,1975)。研究者们认识到,如果权力被看成是对资源的控制的话,那么以研究职业流动的面目出现的对社会不平等和流动的研究,就会与主要的分层过程相联系,同时也间接地提供了关于身份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信息。因此,流动,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结构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在构筑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Giddens,1973)。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以“混合经济”为特征,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产生于再分配系统之外的市场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原来在国有部门中的人们,一方面感受着市场体制提供的新的制度结构的激励,一方面又面对着原体制中业已确立的种种约束。在市场渗入的同时,这些理性行动者开始在逐渐松动的约束所许可的范围内确定和追求自身利益。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市场的预期超过对原体制的预期时,他们所作出的流向非国有部门的决定也便成为一种正反馈,促进了市场对资源和机会控制权的生长,由此也在改变着社会的分层机制和机会结构。换句话说,社会力量不仅从社会制度那里“注入”了个人生活,而且也从个体的行动中“渗透”出来,从而改变着现有的社会格局和设置(Mayer等,1990)。人们不会否认,非国有部门群体的成长,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这一“社会事实”才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二、用“动态方法”来研究职业流动

回溯对职业流动及地位获得的文献,研究者们最初更多地是对个人因素的关注,然后开始注意到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作组织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开始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试图区分出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他们的研究中都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结构性的因素都是既定的、稳定的,因而缺乏对结构变迁的考虑。在这些研究中,地位获得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空位竞争理论(vacancy competition theory)都曾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后来,当研究者们将变动中的市场结构引入职业流动研究后,上述以相对稳定的结构为前提的理论模型则被冠以了“静态方法”或“半静态方法”之名(Blossfeld,1986)。

地位获得理论(Blau & Duncan, 1967)探讨了教育、父亲地位以及其他背景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该模型以个人主义为取向,它假设职业对任何拥有必要资源的个人都是开放的,而结构因素及其变迁则完全可以忽略。这种“静态方法”遭到了后人众多的批评,当然也是许多理论的起点。人力资本理论(Becker, 1975)则认为职业获得的不同水平反映了生产效率的差异,而生产效率正是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的回报。这一理论关注的是教育、职业培训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历等因素。虽然该理论引入了工作经历变量,但仍未考虑制度环境变迁而导致的市场的变化,因而可以被视为“半静态方法”。空位竞争理论(Sorensen, 1977)是关于社会经济获得是如何发生的理论。它认为是新的职位的产生,而非个人资源的变化,是流动的中心机制。这种理论将职业结构引入了流动研究,但仍缺乏对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同龄群体(cohort)效应和时期效应的考察,故也是一种“半静态方法”。

随着对纵贯性(longitudinal)数据分析方法的进展,研究者们现在可以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将职业流动及地位获得过程中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纳入模型中,把结构变迁和个人特征结合起来考虑。本次研究也试图通过同时考察生命过程中变动着的个人特征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时空差异,运用这种“动态方法”探究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这一“事件”所表现出来

的动态特征及其理论含义。

三、研究视角和假设

(一)结构性因素

1. 单位分割效应

我们之所以考察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还在于“国有”与“非国有”这一最根本的所有制类型的区分, 同时也是再分配体系和市场体系的最重要界限。已有的关于中国职业流动的经验性研究表明: 个人在原有体制中所具有的户口、档案编制、所有制等几种身份中, 所有制身份最多地保留了它过去的影响(陈婴婴, 1995)。由于个人所在单位的性质反映着他在分层体系中的位置, 因此是否愿意跨越这个界限, 便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在混合经济中, “再分配”与“市场”并非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两个体系各自所具有的动力机制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发挥影响, 共同作用于个人和群体的社会位置的变动(Nee, 1991)。依据经济分割理论的提示, 在任何复杂社会和政治经济形态里, 结构性的分割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区别只在于分割在实现过程中所遵循的标准的不同(Lin & Bian, 1991)。在市场经济中是因为生产效率或资本投资收益的差异而产生分割, 而在再分配经济中, 经济分割则是通过与国家的产权关系和在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决定的。这种经济分割表现在可以测量的指标上就是所有制类型和单位级别。这意味着, 不仅在再分配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存在着资源和机会的差异, 在这两个体系内部的不同部门或机构之间, 资源和机会的分布也不是均衡的。

在本次研究中把所有制作为分割因素, 国有部门被细分为国有机构(包括党政军机关、国家或集体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半国有部门(民办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合作企业或联营企业、乡镇及村办企业)三类, 这可以被简单地看成对再分配体制的“核心”部门和“边缘”部门的区分。这种分割维度与单位级别的分割维度结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单位分割效应”。这种与国家间产权关系的差异, 再加上单位级别的作用, 其直接后果就是不同的国有部门在所占资源和利益分配上存在一定差别。单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会直接反映到个人的层次上, 导致了不同单位中的从业人员在收入获得和福利分配上的差别(Walder, 1992)。在这种前提下, “再分配”和“市场”的双重机制在这些不同的国有部门之中发挥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体现在人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上, 则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流动类型和社会选择机制。我们研究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对这些不同的类型和机制作出一些经验论证和理论阐释。

2. 阶段性效应

对 1978 年改革以来的短短 20 年时间作出阶段性的划分是一件冒险的事件。但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中国进入市场化改革以来的这段特定的加速转型期, 所以有理由认为急速的社会转型使得出现结构性、阶段性变化的时间间隔已大大缩短。因此, 本次研究尝试着将 1978 到调查截至的 1996 年分为 1978 ~ 1984、1985 ~ 1991、1992 ~ 1996 三个阶段, 并希望在这样的划分中表明变动中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状况对特定阶段人们的职业期望的影响, 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流动群体在群体特征和规模上的差异。

事实上, 关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者已经尝试着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区分, 例如他们所提出的“局部”改革(partial reform)的概念(Nee, 1991)。撒列尼(Szeleányi, 1996)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对市场渗入的三种类型的划分, 实际上也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划出了两个阶段, 即 1977 ~ 1985 年的“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阶段, 和 1986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混合经

济”阶段，并就其制度性特征和在社会分层中的意义进行了具有启发意义的阐释。李强（1996）在结合经验数据对“脑体倒挂”现象的变化进行解释的时候，提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理论，其意义在于揭示了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变革的阶段性和阶段性。本次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重要的提示，并希望对其做进一步的验证。

运用事件史方法，对中国城镇劳动力的职业地位获得及流动进行历时性考察始于周雪光等人的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从国家政治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比较了1949至1993年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1949~1965, 1966~1979, 1980~1993）中初职和党员地位的获得（Zhou等, 1996），而且还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1949~1965, 1966~1979, 1980~1994）不同单位类型、经济部门之间的工作转换（Zhou等, 1997）。这些成果为本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也为我们进一步剖析市场化以来的阶段性特征奠定了基础。此外，宋时歌（1998）在提出“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时，将改革的不同时期进行划分，并对其假设作出的验证也增添了我们考察阶段性效应的信心。

3. 地区效应

中国所经历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地区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非均衡性。因此对一个全国样本进行研究不能不考虑其中的地区差异。不同省份、甚至是同一省的不同地市之间，在市场渗入程度和制度环境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职业流动的方向和强度。

维克托·倪（Victor Nee）在他处理的一个规模为8000户、但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样本里对地区差异进行了控制。通过以各省不同经济类型的工业产出比重为聚类标准，他区分了“自由主义的”（laissez-faire）、“法团主义的”（corporatist）、“再分配的”以及市场化程度很低的“内陆”（inland）省份，并以此分类对收入问题进行了地区间差异的比较（Nee, 1996）。

本次研究也将借鉴这种思路对地区间在工作转换上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我们用2个指标对样本所分布的24个省进行了聚类分析。这两个指标分别是：（1）第一产业占本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①这一指标反映了各省的工业化水平；（2）流动人口比例，这一指标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反映。^②在运用平均联结法中的组间联结法（Between-groups linkage）进行数据分析之后，这24个省被分成了三组（参见表1）。我们认为，较之倪的做法，我们采用的分类变量更能够综合反映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

表1 聚类分析结果

组别	省份	第一产业比重(%)		流动人口比例(%)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第一组	北京、上海、天津	4.70	2.00	12.36	3.81
第二组	福建、广东、河北、黑龙江、江苏、浙江、辽宁、山西、陕西、	18.27	3.08	5.08	1.21
第三组	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吉林、内蒙古、四川、云南、 贵州、甘肃、广西	28.61	3.39	3.16	1.31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5页。之所以没有选用第二产业比重，是为了避免如下情况，较低的第二产业比重可能是由于第一产业还占很大优势所造成的，但也可能是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结果，二者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产业化水平。

②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74—75页。使用的是1996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抽样比为1.028‰。该比率是用“住本调查小区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数除以被调查人口数得到的。

4. 同龄群体(Cohort)效应

人们是在不同的结构背景下经历生命历程中的各种重要事件的。不同生命轨迹中较后的一些结果,部分是因为较早的环境、事件和经历所导致。不同的同龄群体可能会经历不同的事件,即使是有过共同的遭遇,对不同同龄群体的影响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近百年中国社会的风云突变往往让相差六七岁的人之间就有一种“隔代”之感,这就是同龄群体效应最感性的表现。

本次研究中年龄最大的被访者是1927年出生的,最小的于1977年才出生,这些被访者在年龄上的跨度整整有半个世纪之长。因此,他们在生活经历以及市场化过程提供的机会结构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如果说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对人们今后的职业流动状况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样,面对体制外的召唤,处于生命周期中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作出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问题上,我们也将考察不同的同龄群体表现出的不同流动模式。

(二)个人因素

个人总是在一定的结构背景下,结合自己的一些个人因素进行“计算”之后才作出行动选择的。在那些可能会有影响的个人因素中,被研究者们予以关注的大致有以下几个:中共党员(下文中简称党员)资格、干部身份、教育程度,此外还有性别和家庭出身。

党员资格和干部身份一般被认为属于政治资本。拥有这些资本的群体可以被看成是再分配体制中的“精英”人物,他们不仅从意识形态上更认同原体制,而且往往也占有体制中较多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因此,在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动过程中,政治资本较为可能发挥的是阻碍性的作用。至于家庭出身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常用它来作为一项划分不同群体的标准,但这并不能排除它还潜在发挥着传承父辈的一些特征(例如文化资本)的作用。撒列尼对匈牙利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原体制松动后最容易成为具有较强市场取向的农村企业家,恰恰是那些出身“不好”、在再分配体制中受到一定排斥、但其父辈有过经营资本主义性质农场经历的人(Szelényi, 1988)。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在市场环境中更容易得到相应的回报。按照这种看法,人们会预见随着市场中资源和机会拥有量的增加,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体制中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会开始进入市场领域,并获得优势地位。

性别差异在再分配体制中被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平等化政策缩小到了很低的程度。但在市场化改革开始后,这种状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这一“事件”而言,由于非国有部门中工作的风险性和劳动强度较高,加上在有关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社会观念中,一般认为,女性应承担相对安稳、轻松一些的工作,而在料理家务和照顾子女方面应承担较多的责任。因此,有理由认为,愿意放弃原体制中工作的女性可能不会如男性那样多。

(三)假设

在对可能影响跨体制流动的结构因素和个人因素进行初步探讨之后,本研究将沿着上述思路对以下八个假设作出检验:

假设一:在市场渗入的过程中,从国有部门的“核心”到“边缘”,即按照国有机构、国有部门、半国有部门的顺序,流入非国有部门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假设二:原来所在国有部门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流入非国有部门的发生率越低。

假设三:在不同的市场化阶段,人力资本(教育程度)在进入非国有部门中发挥的作用出现了从阻碍向促进的转变。

假设四:单位分割因素(单位类型和级别)在市场化的不同阶段的作用不同。

假设五:新生代(较后的同龄群体)在实现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假设六:不同的地区在流动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七:党员和干部身份在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中显示的是阻碍作用。

假设八:男性在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中占有相当的优势。

四、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本次研究采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于1996年6月至10月进行的一次全国性城市居民抽样调查结果。样本跨越了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样本量为3087个。

这次调查采用的是多阶分层整群抽样。首先,除西藏以外,我们把全国所有县级单位排成一个序列(array),排序的标准是各县20至69岁的城市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这一序列被分成规模相等的25层(strata),让每个层中含有大致相等的20至69岁的城市人口。然后,按照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原则,我们在每一层中抽取2个县,在每个县级单位中抽取1个镇级单位(或街道),在每个镇级单位中抽取2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中抽取30户,最后是在每一户中再随机抽出一名年龄在20至69岁之间的家庭成员进行访问,由此构成了整个样本。

数据记录了被访者完整的受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其中有关工作经历的回溯性信息涵盖了被访者每一次在职业、工作单位类型、工作单位级别、职位等方面的变化,数据还包括了有关这些被访者家庭结构、生活状况、文化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信息。

(二)模型

本次研究主要是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离散时间Logit模型(Allison, 1984; Singer等, 1993)来考察1978年以后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的风险率。事件史分析的主要优点是:在分析随时间变化的各种生命事件发生的风险率时,能够把以前生活经历中的有关信息和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纳入到模型中来,并能够很好地处理删截(censoring)的问题。该方法的特点正好与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对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各种因素的不同作用的关注相契合。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们将考察下列7个模型:

1. 总模型

模型1:1978年到1996年间,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2. 各阶段模型

模型2:1978年到1984年间,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模型3:1985年到1991年间,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模型4:1992年到1996年间,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3. 不同国有部门模型

模型5:从1978年到1996年间,从国有机构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模型 6: 从 1978 年到 1996 年间, 从国有企业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模型 7: 从 1978 年到 1996 年间, 从半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

上述模型所采取的形式是:

$$\ln \frac{P(t)}{1-P(t)} = a(t) + b_1X_1 + b_2X_2(t)$$

在运用上面的模型进行估计之前, 需要将数据转换为由处于风险集中的所有观测组成的人 * 年数据集。以模型 1 为例, 它研究的事件(event)是 1978 年至 1996 年间, 第一次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与其相对应, 它的风险集(risk set)是指从 1978 年至 1996 年的每一年里, 那些尚未经历过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这一事件的, 并且当时正在国有部门中工作的人。如果其中的某个人在某一一年中发生了我们所定义的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的事件, 从下一年开始, 这一个人则不再属于风险集之中; 如果这个人直到调查截至的 1996 年还未发生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 那么将被作为右删截(right-censored)处理。模型中的 P(t)被称作风险率(hazard rate), 指的是在某一时期里, 对风险集中的特定个人而言的事件发生概率, 因此它应被视为一个条件概率。对 P(t)进行 logit 转换以后, 得到了模型的左端, 被称为对数发生比。我们在分析参数时, 考察的就是经过对数还原之后的发生比的比率。

五、变量说明

(一)因变量

我们在本文中关注的是中国城市劳动力中, 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的发生率。对工作转换的发生率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的:

1. 我们将 1978 至 1996 年间的 19 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78 年到 1984 年是中国进入改革的初期, 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是在农村, 城市中非国有部门的范围还很小。(2)1985 年到 1991 年可以被看成是城市改革正式启动的第一个阶段; (3)1992 年到调查截至的 1996 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的开始。之所以进行这种划分, 是因为我们希望研究在不同的市场化阶段, 个人以及结构性的因素(模型中的协变量)对工作转换的不同效应。

2. 按照工作单位与国家的产权关系, 我们将工作单位类型定义为: (1)国有部门, 包括党政军机关、国家集体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办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合作和联营企业、乡镇及村办企业等; (2)非国有部门, 包括个体及私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等。此外, 为了进一步考察国有部门之间在转换模式上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又将国有部门细分为三个子类: I. 国有机构, 包括党政军机关、国家或集体的事业单位; II. 国有企业; III. 半国有部门: 包括民办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合作企业或联营企业、乡镇企业。对这三类国有部门进行分别考察时, 我们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于原有再分配体制中的不同部门, 自变量对工作转换的作用和效应是否一致。

(二)自变量

本次研究中采用的主要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 具体用教育程度来测量。政治资本, 用党员、干部身份、家庭出身等变量来测量。此外还有区分不同单位类型和单位级别的变量。上述变量除家庭出身以外都是随时间变化的, 属于时变变量(time-varying variable)。

控制变量则包括性别、时期、出生组(同龄群体)、地区等变量(参见表 2)。

表 2

自变量的名称、类型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教育程度	定类变量	1: 小学及以下(不识字、能够阅读、私塾、初小、高小) 2: 初中 3: 高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中技) 4: 大专及以上学历(普通大专、“五大”、大学、研究生等)
党员	定类变量	1: 是 0: 不是
干部身份	定类变量	1: 干部(股级以上职位) 0: 非干部
家庭出身	定类变量	1: 革命家庭(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或革命烈士) 2: 普通工农(工人或贫下中农) 3: 小资产阶级(中农、小业主、职员或自由职业者) 4: 反动阶级(资本家、右派分子、富农、坏分子、地主或反革命)
前单位类型	定类变量	1: 国有机构 2: 国有企业 3: 半国有部门
前单位级别	定类变量	1: 地、局级及以上 2: 县、处级 3: 乡镇科级 4: 村股级
性别	定类变量	1: 男 0: 女
时期	定类变量	1: 时期一, 1978~1984 年 2: 时期二, 1985~1991 年 3: 时期三, 1992~1996 年
同龄群体	定类变量	1: 1927~1936 年出生 2: 1937~1946 年出生 3: 1947~1956 年出生 4: 1957~1966 年出生 5: 1967~1976 年出生
地区	定类变量	1: 第一组(具体省份参见表 1) 2: 第二组 3: 第三组

六、结果分析

在研究中的 7 个模型进行运算之后,我们不仅得到了从 1978 年到 1996 年这 19 年间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的总模式,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国有部门的流动模式。

(一)1978~1996 年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的总模式

为了更好地把握各个自变量对转换工作发生率的作用,考察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我们在计算模型 1 时采用了将变量分步纳入模型的策略。基本发现如下(参见表 3):

1. 时间的效应:结果显示,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从业人员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

部门的趋势基本呈上升态势;各个年代的效应在1987年以后开始显著,90年以后的转换率基本都在参照组1978年的3倍以上,例如高峰时期1992年的转换率就达到了1978年的4.26倍($\exp(1.3931)=4.26$)。转换率在1996年之所以没有显著效应则很可能是我们的调查未能延续到年底的缘故。我们清楚地看到,年代变量的作用在我们的每一步模型中都是显著的。这不仅说明了采用事件史分析这种“动态方法”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而且为我们将要进行的不同阶段的比较奠定了基础。

2. 教育的总体作用:从1978到1996年整个时期来看,个人的教育水平在转入非国有部门的过程中起的是阻碍性的作用,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转入非国有部门的可能性越小。需要指出的是,在加入单位级别和单位类型变量之后,教育程度的总体效应就变得不太显著了。这时,仅有“高中”这一类别与作为参照组的“小学及以下”的转换率存在显著差别,从数字上讲,前者的发生比为后者的60%左右。

3. 干部、党员与家庭出身:在党员变量被加入模型中之前,干部身份对转入非国有部门显示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在党员变量加入之后,干部身份阻碍作用的显著性消失,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党员在这种转换中的明显“落后”,不具有党员身份的人流入非国有部门的可能性比党员们高了一倍以上。我们的假设七得到了部分的证明。家庭出身的作用虽然不太显著,但我们从这一变量作用的不同方向上仍可以看到,越被再分配体制的意识形态所认同的家庭出身,转换率也越小,而那些“出身较差”的人(“小资产阶级”或“反动阶级”出身)则能较快地进入市场。

4. 单位级别与单位类型:在控制了其它变量之后,这两个因素仍然显示了十分显著的效应。就单位类型而言,与国有企业相比较,从国有机构中流向私营部门的发生比仅为前者的一半左右,而半国有部门中从业人员发生转换的可能性则比国有企业高出一半左右。这一结果与假设一相符。从单位级别来看,人们在原体制中所在单位的级别越高,他们流向体制外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也证明了假设二。

5. 同龄群体的效应:年轻人在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以1967~1976年出生的人为参照组,1937~1946年组的转换发生率仅为前者的20%左右,1947~1956年组为参照组的50%左右,1957~1966年组为参照组的60%左右。较为特殊的是1927~1936年组,虽然数据显示这个群体与1947~1956年组的水平相当,但发生转换的人中约有40%的人都是在退休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排除这个因素后,其发生比实际上与1937~1946年组相当。这反映了在市场机会面前代际间的不同机会结构,说明新生的市场与年轻人是具有亲和力的,从而证明了假设五。

6. 性别差异:从性别的影响因素来看,男性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的发生率明显要高出女性,数据显示,其可能性是女性的1.9倍左右。假设八与这一结果是相符的。

7. 地区效应:在对模型进行试运算时,我们把样本分布的24个省份当成虚拟变量带入了模型中,数据显示各省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换之以聚类分析后生成的地区变量,数据则显示出地区变量的整体作用很微弱($P > 0.1$),仅第二组省份与作为参照组的第三组相比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在这些省中,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的发生率约为第三组的省份的80%。这一结果表明,产业化和市场化较高的地区,转换率还相对较小。对此我们不愿轻易地作出结论,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调查中没有记录关于跨省迁徙情况,所以各人*年纪录中的省份变量是以调查时所在的省代替的。虽然对参加工作以后的中国人而言,跨省迁徙

的经历还相对较少,但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仍会带来一些偏差。二是本次研究采用的分类指标仅用了1996年的数据。允许采用这种做法的前提假设是,在市场化改革的19年来,各省之间的相对差距是不变的。显然,这种做法的不足与上一点有相似之处。从以上两点缺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进行严格的事件史分析对数据的特殊要求。第三,虽然我们所考察的转换率在各省之间显著地存在着差异,^①但是我们意识到,影响差异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我们用第一产业比重和流动人口比例来度量的产业化和市场水平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究竟是哪个层次的环境变量(context variable)在发挥作用,又是哪些环境变量在影响这种转换,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假设六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证明。

(二)对不同阶段转换模式的考察

在对模型2、模型3以及模型4的计算中,我们关注的是自变量在市场化各个阶段中发挥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分析结果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些阶段性差异(参见表4):

1.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教育因素发生了从阻碍转换到促进转换的变化。在我们定义的市场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即1978~1984年间,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更多的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初中文化程度群体的转换可能性仅为小学及以下(参照组)文化程度群体的41%,高中的为1/4左右,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改革初期从国有部门转入非国有部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其发生比仅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的0.2%。在市场化进程的中期,即1985~1991年这个阶段,教育所产生的明显的阻碍作用已变得不再显著,但其作用仍是负方向的,相对于低教育水平的参照组,其它各个群体的转换几率都提高到了60%~70%。到第三个阶段,即1992年以后,教育开始显示正向的推动作用,这表明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群体从国有部门中流入到了非国有部门之中。这一结果证明了假设三。

2. 单位级别的意义减弱,而单位类型的制约日益明显。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单位级别的效应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但各级别单位间转换率的差异在减小。到了第三个阶段,各单位级别在总体上的差异已很微弱,唯一有显著差异的,是处级单位的转换率相当于股级单位转换率的一半。不同单位类型之间的差异却日益显著,在第一阶段中,国有机构与国有企业之间没有什么差异,而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二者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到1992年以后,国有机构的转换率尚不到国有企业的40%,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转化率从第一阶段的仅为半国有部门的一半左右,增长到70%以上。我们会联想到,这种变化与国有企业的相对衰落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一过程反映出的单位分割因素在市场化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证明了假设四。

3. 政治资本中党员身份的阻碍作用依然明显,家庭出身和干部身份的作用日渐消失。比较三个阶段的参数及显著水平,非党员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中日益具有明显的“优势”,在1992年以后其转换发生比更是相当于党员的2.5倍左右。从家庭出身来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更倾向于进入非国有部门,“反动阶级”出身的人在第二个阶段显示出了更高的可能性,到第三个阶段,不同家庭出身之间的差别就不明显了。同样,是否具有干部身份对于人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动而言,其阻碍性的作用在日益降低,并且不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4. 青年人和男性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中虽仍然占据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市场化改

^① 作者曾把代表各省份的虚拟变量代入模型中,发现各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该分析结果在本篇文章中未列出来,但作者可将其提供给感兴趣的读者。

革的进程中有日益缩小的趋势。比较这两个变量在不同阶段中参数的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三)对不同类型国有部门转换模式的比较

在对阶段性的差异进行考察之后，让我们把视角深入到不同类型的国有部门之中，在对模型 5、6、7 结果的比较分析中，我们仍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参见表 5)。

1. 从市场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从国有企业和半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的势头依然显著，其中尤以国有企业中转换率的增长更为突出。但在国有机构中则显示了势头的回落，即相对于第二阶段，国有机构中的人在 1992 年以后反而不愿意脱离原单位了。

2. 单位级别的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十分显著。所在企业的行政级别越高，人们流入非国有部门的可能性就越低。

3. 党员身份在国有机构中的阻碍效应比国有企业更为突出，相对前两者而言，这种差别在半国有部门中并不具有显著性。而性别上的差异则在国有机构和半国有部门中十分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则不太明显($P=0.11$)。

表 3 1978 ~ 1996 年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发生比的极大似然估计(模型 1)

变 量	分步模型的回归参数和显著性检验								
年代	*	*	*	*	*	*	*	*	*
1978(参照组)									
1979	-1.3578	-1.3441	-1.3422	-1.4385	-1.4361	-1.4415	-1.4411		
1980	.5618	.5777	.5792	.5504	.5516	.5312	.5288		
1981	.0350	.0625	.0638	.0279	.0314	-.0024	-.0054		
1982	.5804	.6180	.6181	.5729	.5790	.5307	.5267		
1983	.4371	.4865	.4895	.4442	.4500	.4018	.3985		
1984	.1287	.1835	.1884	.1429	.1525	.0915	.0926		
1985	.2668	.3269	.3332	.2821	.2944	.2210	.2191		
1986	.3814	.4494	.4580	.4110	.4270	.3462	.3454		
1987	1.0548 *	1.1280 **	1.1375 ***	1.0916 *	1.1080 **	1.0029 *	1.0038 *		
1988	.8452	.9307	.9419	.9009	.9203	.7807	.7840		
1989	1.1631 **	1.2541 **	1.2656 **	1.2233 **	1.2470 **	1.0954 *	1.1011 **		
1990	1.4196 ***	1.5227 ***	1.5330 ***	1.5169 ***	1.5418 ***	1.3686 **	1.3735 **		
1991	.9301	1.0407 *	1.0482 *	1.0288 *	1.0556 *	.8613	.8664		
1992	1.4485 ***	1.5704 ***	1.5789 ***	1.5706 ***	1.5990 ***	1.3883 **	1.3931 **		
1993	1.3398 **	1.4714 ***	1.4775 ***	1.4744 ***	1.5070 ***	1.2835 **	1.2875 **		
1994	1.3283 **	1.4712 ***	1.4770 ***	1.4770 ***	1.5134 ***	1.2752 **	1.2806 **		
1995	1.3099 **	1.4588 ***	1.4663 ***	1.4817 ***	1.5195 ***	1.2656 **	1.2717 **		
1996	.5048	.6561	.6614	.6697	.7082	.6247	.4354		
教育程度		*	*	*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1075	-.1427	.0355	.0013	-.2430	-.2193		
高中		-.5562 ***	-.5494 ***	-.2240	-.2774	-.4943 **	-.4895 **		
大专及以上		-.9794 ***	-.8726 ***	-.1576	-.1774	-.5393	-.5309		
干部身份									
非干部(参照组)									
干部		-.7760 ***	-.5288 *	-.2612	-.2253	-.2505			
单位级别				*	*	*	*	*	
局级及以上				-1.2811 ***	-1.2496 ***	-1.2995 ***	-1.3129 ***		

变 量	分步模型的回归参数和显著性检验			
处级	-1.0314 ^{***}	-1.0232 ^{***}	-1.0825 ^{***}	-1.0751 ^{***}
科级	-.5516 ^{***}	-.5366	-.5818 ^{***}	-.5739 ^{***}
股级(参照组)				
单位类型	*	*	*	*
国有机构	-.7758 ^{***}	-.6913 ^{***}	-.5930 ^{**}	-.6048 ^{***}
国有企业(参照组)				
半国有部门	.5031 ^{***}	.4555 ^{***}	.4407 ^{***}	.4421 ^{***}
党员身份				
非党员(参照组)				
党员		-.8137 ^{***}	-.7832 ^{***}	-.7723 ^{***}
家庭出身				
革命家庭		-.0194	-.0683	-.0898
普通工农(参照组)				
小资产阶级		.2043	.2938	.2889
反动阶级		.3226	.4642	.4166
出生组				
1927~1936			-.7954 ^{**}	-.7900 ^{**}
1937~1946			-1.5006 ^{***}	-1.5139 ^{***}
1947~1956			-.6959 ^{***}	-.6912 ^{***}
1957~1966			-.4908 ^{**}	-.4871
1967~1976(参照组)				
性别				
男			.6172 ^{***}	.6218 ^{***}
女(参照组)				
地区				
第一组				-.2880
第二组				-.2341 [*]
第三组(参照组)				
常数项	-5.6486 ^{***}	-5.4575 ^{***}	-5.3825 ^{***}	-5.0531 ^{***}
似然比卡方检验	60.677 ^{***}	80.171 ^{***}	90.417 ^{***}	178.868 ^{***}
			191.281 ^{***}	237.004 ^{***}
				240.213 ^{***}

* $P < .10$, ** $P < .05$, *** $P < .01$

表 4 不同阶段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发生比的极大似然估计

变量	1978~1984(模型 2)	1985~1991(模型 3)	1992~1996(模型 4)
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8872 ^{**}	-.2616	.5852
高中	-1.3156 ^{***}	-.5032	.3392
大专及以上	-6.4558	-.3360	.2537
干部身份			
非干部(参照组)			
干部	-.5952	-.2971	-.0212
单位级别	**		
局级及以上	-6.6677	-1.8046 ^{**}	-.5300

变量	1978~1984(模型 2)	1985~1991(模型 3)	1992~1996(模型 4)
处级	-1.9308 ***	-1.0336 ***	-0.7292 **
科级	-0.5656	-0.7277 ***	-0.2467
股级(参照组)			
单位类型		**	***
国有机构	0.0838	-0.4134	-0.9209 **
国有企业(参照组)			
半国有部门	0.6912 *	0.4843 *	0.3160
党员身份			
非党员(参照组)			
党员	-0.2947	-0.8707 *	-0.8999 **
家庭出身			
革命家庭	-5.7456	0.2652	-0.1628
普通工农(参照组)			
小资产阶级	0.8509 **	0.1832	-0.1328
反动阶级	-0.0037	0.9367 **	-0.1730
出生组	**	***	
1927~1936	-1.4504 **	-1.0247 **	-0.2257
1937~1946	-2.3193 ***	-1.5739 ***	-1.0048 *
1947~1956	-0.6340 *	-1.2146 ***	-0.2535
1957~1966		-0.8361 ***	-0.4589 *
1967~1976	-0.80211		
性别			
男	0.8863 **	0.6651 ***	0.4144 *
女(参照组)			
常数项	-4.1963 **	-3.2688	-4.1082
似然比卡方检验	82.492 ***	87.952 ***	50.592 ***

* $P < .10$, ** $P < .05$, *** $P < .01$

注: 模型 2 中出生组变量以 1957~1966 年为参照组。

表 5 1978~1996 年各类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发生比的极大似然估计

变量	国有机构(模型 5)	国有企业(模型 6)	半国有部门(模型 7)
阶段		***	**
1978~1984(参照组)			
1985~1991	0.6471	0.9907 **	0.5362 **
1992~1996	0.5212	1.4776 ***	0.7342 **
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1.3226 **	0.1112	-0.2813
高中	-1.8377 ***	-0.3197	-0.2599

变量	国有机构(模型 5)	国有企业(模型 6)	半国有部门(模型 7)
大专以上	- 1. 3435 **	- . 2753	- 1. 3591
干部身份			
非干部(参照组)			
干部	. 4917	. 0680	- . 8649
单位级别		***	**
局级及以上	- . 8122	- 1. 4378 ***	- 6. 8728
处级	- . 6334	- 1. 2150 ***	- 1. 3330
科级	- . 5350	- . 9374 ***	- . 4222
股级(参照组)			
党员身份			
非党员(参照组)			
党员	- 1. 4135 **	- . 7741 *	- . 3044
家庭出身			**
革命家庭	. 6803	- . 0736	- . 5459
普通工农(参照组)			
小资产阶级	- . 2559	. 0067	. 6922 ***
反动阶级	1. 0546	- . 3164	. 7844 *
出生组		***	*
1927~1936	- 1. 8700 *	- . 8335	- . 6617
1937~1946	- 2. 1751 **	- 1. 4418 ***	- 1. 3126 ***
1947~1956	- . 8216	- 1. 0927 ***	- . 3107
1957~1966	- 1. 0765 *	- . 6313 **	- . 5724
1967~1976(参照组)			
性别			
男	1. 0187 **	. 3404	. 8169 ***
女(参照组)			
常数项	- 3. 9597 ***	- 4. 2315 ***	- 4. 1279 ***
似然比卡方检验	31. 111 **	79. 803 ***	64. 882 ***

* $P < . 10$, ** $P < . 05$, *** $P < . 01$

七、讨论及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化改革以来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换工作的历史面貌,还比较了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中的作用。最后,我们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后果

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反映着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的改变,透过对这种转换历时性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事件发生之背景的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首先反映了原有体制中从“核心”到“边缘”的不同部门与新生市场体系的关系。

第一阶段(1978~1984年)以个体经济和少量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新生为特征。在这一阶段中,体制外的资源占有比例很少,其产业规模和经济实力有限,对体制内的渗入较多地体现在处于边缘的半国有部门。国有机构和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这种差异从半国有部门中从业人员首先较多地进入市场,而国有机构和企业的转换率都相对较小可以体现出来。第二阶段(1985~1991年)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主线,开始在原体制的框架内将市场规则引入到

国有企业之中,使国有企业出现分化。在这一阶段中,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在规模和行业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开始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市场便在体制内外的“双重”作用下渗入了国有企业。国有机构的权力作用范围在这一阶段仍以控制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运行为主,但国有机构对国企改革进程的控制和通过后者获得的市场机会,使其相对国有企业具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体现在本次研究中,即表现在虽然国有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转换率较之第一阶段在增长,但国有机构的转换率远低于后者。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正式进入了政府全面主导市场改革的时期。在国有企业进一步衰微和体制外资源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国家一方面仍在为大中型国有企业“输血”,另一方面转而将非国有部门作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由此,国有机构的权力开始更多地进入了体制外。这样一来,政府的行政权力在 market 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其作用范围扩大并得到了延续。政府全面参与市场改革,一方面可能加速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一方面又为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的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多的机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级政府的裁员越来越难以推进,也不难得出数据所显示的国有机构转换率在这一阶段比第二阶段反而更低的原因。

我们从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进程中看到,市场渗入的后果对原有体制中不同部门来说是完全不同的。随着市场的渗入,原有体制中的生产部门(以国有企业为主)在市场竞争中衰落,而管理部门(以各级政府为主)的权力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作用范围还在随着“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推进而扩大,并同时伴随了资源与“机会”拥有量的增加。这一过程对转型中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单位分割的松动与延续

单位分割是结构性分割在社会组织层次的表现形式。在改革以前的再分配体制中,这种分割是依照不同国有部门与国家的产权关系和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而实现的。同时,国家所控制和垄断的稀缺资源,通过单位这种“总体性组织”在社会成员间进行分配,个人及其家庭的就业、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业、副食补贴以及其它福利等资源的获得,都通过单位来实现(孙立平,1993)。其结果造成,个人所在单位的特征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甚至超过个人的职业特征(Bian,1994)。这也是我们认为国际职业声望值和国际社会经济指标对中国分层研究的不适用之处。在这种情景之中,单位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职业流动,尤其是在决定脱离原有体制,转入非国有部门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单位类型和单位变量之后,这种单位分割效应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干部身份的显著性,并且在分步考察的所有变量里,单位变量的作用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原有体制中的单位分割效应既出现了一些松动,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这种松动来自于体制外资源的膨胀和所占比例的日益增大,以及市场对原体制的日益渗入。表现之一就是,对国有企业,开始更多按照市场经济中工作组织自身的生产效率或资本投资收益而非原有的单位级别的标准进行区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中的延续性又根源于我们在上一点中所讨论的体制内国有部门的分化,以及现实中日益明显的各部门、单位的“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我们观察到,在变化了的资源占有和机会分配格局中,各种类型的国有部门向体制外的流动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单位分割的松动与延续”论题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得到的印证是:单位分割因素中行政级别因素的效应在降低,而单位类型因素的效应在日益显著。这是因为前者更多地反映了原有体制中的分配标准,而后者反映了市场渗入后原有体制中不同类型部门的分化。因此,原有

体制中单位分割效应的延续和松动,其实质就是在市场经济中新的分割标准的涉入后,原有分割标准在不同方向上的变化。此外,在对国有企业流出模式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单位级别的显著性,反映了国有企业在市场和再分配体系接合部中的特殊性。政府一方面在将国企推向市场,让其承担独立的风险和责任,以市场规则来运作;另一方面仍在“抓大放小”,不断以再分配方式在大中型企业投入回报甚微的巨资。在这些资金的分配中,与企业规模相关程度很高的单位级别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这也算是职业流动中的“政治动力学”在混合经济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 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变革的阶段性

在市场化进程中,各社会群体参与市场经济的步骤和速度是不一致的。原体制中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心群体)由于受到既得利益较多的制约,所以他们要等到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体制外的资源具有足够吸引力时才会转入新的体制中;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边缘群体)受原体制的约束较少,于是他们更容易较早地进入新的体制(李强,1996)。我们下面将按照教育、同龄群体、干部身份和党员身份等不同划分群体的标准对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变革的阶段性作出进一步证明和阐释。

我们的数据基本证明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推进,越来越多的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在开始脱离旧体制,进入到新的体制中来。教育的作用从负向的阻碍作用向正向的推动作用在转化。年轻人在旧体制实行的年功分配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劣势,但在向新的体制的流动中,他们在原体制中的劣势就变成了推动这种转换的优势。我们同时看到,这种年龄优势的时间依赖性在减弱,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更多地转入新体制中。最近几年,由于分配制度、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的改革,加上国有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大大减弱,越来越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就直接进入了新体制中就业,这种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体制外”群体的教育和年龄构成。与此同时,非国有部门的行业分化,尤其是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有统计数字表明,在某些“朝阳”行业中,“体制外”的就业人数甚至已超过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就业人数。^①

我们对不同阶段的研究还展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干部身份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小,即是否干部,在决定进入新体制时的影响力很弱;而党员身份的负面效应则日益明显。我们用市场渗入到一定阶段,“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的分化”来解释这一现象。在原有体制中,对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的提拔标准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于教育学历,后者更注重政治资历(党员)。在权力和特权的分配上,技术干部在原有体制中享有的权威和物质利益较少,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再分配精英”(Walder, 1995)。干部群体的分化表现在,当体制外资源开始对干部阶层具有吸引力时,技术干部会更倾向于进入到人力资本可能获得更高回报的市场中来,直接参与市场;行政干部则更多地留在再分配体制中,通过作用范围扩大了再分配权力间接参与市场。因此,当笼统地考察干部身份时,如果研究者忽略了这种“二元”的干部地位获得途径,以及市场渗入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的分化,就很难对党员与干部身份在跨体制流动中相互背离的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一结论仍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检验和论证。

① 以“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为例,每万名劳动力中在该行业的“国有经济单位”里的职工数为2.2,在“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中为1.2,在“其他经济单位”中则为2.7。《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137页。虽然这种粗略的分类与本研究的划分在严格意义上不十分吻合,但这些数据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陈婴婴, 1995,《职业结构与流动》,北京: 东方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 1997,《中国统计年鉴—1997》,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 1998,《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李强, 1996,“‘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春玲, 1997,《中国城镇社会流动》,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宋时歌, 1998,“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孙立平, 1993,“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探索》第1期。
- 吴敬琏, 1993,《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 Allison, Paul, 1984. *Event History Analysis;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Event Data*. Sage University Paper Series on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eries No. 07-046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Becker, G. S., 1975. *Human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 Blossfeld, Hans-Peter, 1986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ife-course, cohort, and period effect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 No. 3, December.
- Featherman, David L, F. Lancaster Jones and Robert M. Hauser, 1975. “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 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4, Num. 4, Dec. 329—60.
-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 Mayer, Karl Ulrich and Nancy Brandon Tuma, 1990 “Life Course Research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edited by Karl Ulrich Mayer and Nancy Brandon Tuma
- Nee, Victor, 1991, “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267—82.
-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um. 4, 908—49.
- Lin, Nan and Yanjie Bian,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657—88.
- Singer, Judith D., Willett, John B., 1993, “It’s About Time: Using Discrete-Time Survival Analysis to Study Duration and the Timing of Ev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Vol. 18 No. 2 pp. 155—195.
- SzeÉny, Ivan,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Madison, Uni. of Wisconsin Press.
- SzeÉny, Ivan.,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um. 4: 1082—96.
- Sorensen, A. B., 1977,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456—71.
- Walder, Andrew G.,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 Vol. 57(Aug: 524—539).
- ,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June: 309—328).
- Zhou, 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and Phyllis Moen, 1996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1949—1993.” *Social Forces* 74: 759—96.
- Zhou, 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and Phyllis Moen, 1997,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June:339—365).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宛丽